

反“围剿”斗争中的电台战

□ 程宇一 曹明敏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灵活运用电台实施通信联络、侦察、破译、伪装，及时掌握敌军企图和作战部署，有效提升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能力，对挫败敌人阴谋，保存红军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巩固中央苏区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先机制敌立大功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依靠这一部半电台搜获大量情报，使红军对国民党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将敌人打得焦头烂额。1931年4月上旬，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王诤带领无线电队日夜不间断地监听、捕捉敌电台信息。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电台开始联络时，都先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位置。由于参与“围剿”的部队比较杂乱，统一密语行不通，他们之间联络都用明语，这就等于不断向红军报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

1931年5月12日18时，红军无线电队收到敌驻富田的第28师师部电台发给该师驻留守处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是：“我们现在住富田，明晨出发。”敌留守处问：“到哪里去？”敌师部电台回答：“向东固去。”毛泽东和朱德看到情报后，立即下达了“零时起床，一点吃饭完毕，一点半集合、出发，务于拂晓前占领东固一带有利地形，待机歼敌”的命令。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灭敌第28师全部和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同时还缴获国民党军一部100瓦的完整电台，俘获敌第28师全体无线电人员，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在随后的作战行动中，红军电台不断侦听国民党各部队间的往来电报，并以此制订战略部署。最终，红军以极小的损失，作战15天，横扫七百里，取得5战5胜，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的辉煌战绩。在第三次反“围剿”行动中，红军侦收到何应钦“限十天扑灭共匪”的电令，凭借缴获的密码本，将电报内容全部译出。掌握敌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兵力部署后，红军立即决定集中兵力，向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从敌人薄弱的东面打开局面，取得3战3捷。

1933年1月4日至5日，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集中兵力在黄狮渡歼灭国民党军第5师第13



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合影

旅，再占金溪。蒋介石电令第90师和第27师担任主攻，第14师和第5师负责牵制，红军依据敌作战部署分路设伏伺机歼敌。在6日午夜至7日凌晨，独自当班值机的曹祥仁突然发现国民党5部电台异常活跃，均发出十万火急的呼叫。他快速转动旋钮、选台侦听，同时对5个电台信号选择处理，破译出敌人临时改变作战计划，企图分两路合击红军，第14师和第5师负责迂回切断红军退路。红军立即调整部署，红一军团、红二十二军星夜转移至枫山埠附近接敌，增派红五军团到黄狮渡西南阻击国民党军第14师和第5师。最终，红军在枫山埠一带重创敌“铁军”第90师。

在随后的草台岗战役中，军委二局截获敌第5军和第11师来往密码电报，红军三改作战计划，最终顺利围歼国民党王牌部队第11师，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行动。在这几次反“围剿”战役中，侦收的情报成为红军提前掌握敌人动态、下定作战决心的主要依据。

指挥高效同步调

自反“围剿”作战开始，红军无线电队一直使用这一部半电台进行单向通信，只能搜获情报不能沟通联络。最初，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等人带一部电台随毛泽东和朱德在前方，由曾三、刘寅等带收信机在后方实行24小时守听。前方有事时，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了解前方情况。东固一战，红军完整缴获了敌第28师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一部。于是，王诤立即调整

电台人员：由伍云甫、曹丹辉等带15瓦电台跟随毛泽东、朱德到前方；王诤、曾三、刘寅等带100瓦电台，随叶剑英留在后方办事处。不久，王诤截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急电，敌企图趁我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对赣南根据地清剿。面对蒋介石调集的30万大军，红军总部通过无线电联络指挥两个军团主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的兴国集中，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线，再由西至东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歼灭，取得6战5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红军的电台增加到10部。随着电台数量增多和技术力量增强，红军成立了无线电总队，主力部队成立无线电分队，并配置改装电台，建立起无线电侦察台和无线电指挥网，保障了红军总部同各方面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中央苏区还前后数次向湘赣苏区输送无线电通信人才和无线电台，以打通联系。

1931年6月，红军前方电台同后方办事处电台实现我军第一次无线电通报联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由此正式开始。1931年9月，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建立通信联络，完成首次通报，组成了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上海地下党组织搜集到的敌军事情报，可通过无线电源源不断提供给前方，有效配合前方斗争。毛泽东曾评价，“有了无线电通信，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部队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技术人员，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暗中角力识“天书”

由于多次“围剿”失利，国民党军加强了无线电通信保密和密码使用，先后明文规定“党内交流要使用密码”“各个部队要定时更换密钥”，还特聘国外专家为其重新编排电台密码，红军侦收的电报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对此，红军成立专门侦收和破译无线电的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一面布置侦察台抄收密电，通过战况实际分析敌军电报；另一面向周恩来、王诤请教编码规律、敌密码编制和使用规律。1932年8月，红军取得宜黄战役胜利后，缴获国民党军第27师大量电报底稿。曾希圣在敌第9路军司令孙连仲所发30多字的密电中找到线索，他指示侦察台重点抄收孙连仲电报。同时，根据发电习惯、行文风格，比对电文，前后猜字连结，还原出敌“展密”密码本。1933年初，国民党开始使用非明码做底本、上下左右没有固定关系的特别密码本“猛密”，并且更换频繁。即便如此，曾希圣带领人员用7天时间成功破译，全部掌握敌基本位置、行动企图、部署调动、装备补给和口令信号，为红军后续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敌人在“围剿”行动中，还不断加强对我军情报侦收。周恩来在吸取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汉字和阿拉伯数码特点，创编我军最早应用的高级密码“豪密”，只有对话双方各持一本相同书刊按约定顺序查找对应字句，方可翻译电报，实现了“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予敌军分析的机会。为保证我军无线电通信安全，自1932年起，中革军委相继发布了《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关于保障无线电密码通信安全的密令》等无线电通信工作法规，强调无线电通信保密极端重要性，对通信联络保密问题作出具体规定，要求防止技术上失泄密和敌人窃听，建立了严格的通信保密制度和纪律。

（摘自2022年3月3日《中国国防报》）



八本蓝章图书

□ 胡俊

作为中国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可谓浩如烟海，而其中8本100年前盖着蓝色藏书印章的外文图书，却是学府珍藏的瑰宝和共产主义先驱们追寻真理的青春写照。

这8本图书都是德文原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书的封面上都有一个方形蓝色印章，印章上刻6个字：“元慕义斋图书”。元慕义斋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元慕义斋图书如此特殊呢？这得从一位先生和他的青年学生们说起。

1917年底，十月革命一个月之后，李大钊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积极购买新书刊，推动北大图书馆从单纯的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型，更使它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阵地。正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李大钊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重要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欢呼人类新纪元的曙光，成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找到民族解放的道路方向后，就迅速地向进步青年和劳工大众宣传真理，指导青年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投身“再造中华”的运动中。毛泽东后来在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

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秘密组织成立了“马克思（恩）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恩）派的著述为目的”，主要活动包括搜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德、英、法、日等各版本图书，开展研讨、讲演，分组、分专题研究，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并从事工人运动实践等活动。这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年骨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方便工作和扩大影响，当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发起马克思（恩）学说研究会启事”，正式公开亮相。启事刊登后，报名者非常踊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研究会会员就增加到四五十人。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校内拨了两间房子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场所，其中的图书室被称为“元慕义斋”。“元慕义斋”是德文的音译，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元慕义斋”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雅简洁结合在一起，也把这些来自北京大学不同学科的进步青年凝聚在一起，他们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在学习与研讨中读懂马克思，为苦难的民族和人民寻找解放和复兴的出路。

（摘自2022年第3期《党建》）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支M1944莫辛-纳甘步枪。枪的主人叫张桃芳，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4军第72师第214团第8连的一名战士。张桃芳曾用这支枪以436发子弹狙杀了214名敌人，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狙击杀敌的最高纪录。

M1944莫辛-纳甘步枪全长1020毫米，刺刀打开时长1325毫米，枪管长520毫米，口径7.62毫米，初速820米/秒，由苏联于1944年定型生产。在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后，我国政府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大量莫辛-纳甘步枪。由于该枪枪身较短且射击精度较高，深受战士们欢迎，成为志愿军官兵的杀敌利器。1952年9月，张桃芳就是带着这样一支枪走上抗美援朝战场，加入狙击战斗行列。

在刚入朝的一次实弹射击训练中，基础不错的张桃芳竟然3发子弹全部脱靶。沮丧之下，他反复钻研，发现与之前用的“三八大盖”相比，莫辛-纳甘步枪枪管短，击发时后坐力大，子弹出膛时如有丝毫偏差，射出200米以外就会偏出很大距离。找到了问题所在，张桃芳日夜苦练反应速度和射击精度，同时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1953年1月11日，张桃芳随部开赴上甘岭，接替第15军防守。当时，连队要射击技术过硬的战士成立射击组，继续开展狙击战斗，配合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张桃芳通过考核，迎来一展身手的机会。进入上甘岭阵地后的第18天，乘着黎明前的夜色，张桃芳第一次来到射击位置上。天色渐渐放亮，只见从对面地堡钻出两名敌人，张桃芳不待观察员发令，砰砰就是两枪。敌人毫发无损，连忙退回地堡。第一次打移动活靶，张桃芳竟忘记计算射击提前量，不仅未打中敌人，反而招来一顿炮火回击。

第二天，张桃芳吸取教训，趴在射击位上耐心等待。很快，他发现一小队美军从地堡悄悄出来，其中有3人落在后面。做好射击准备后，张桃芳瞄准第一人果断开枪，然而倒下的却是第二名敌人，张桃芳心里直犯嘀咕。原来，战场上射击提前量的估算极为复杂，既要考虑山地的坡度、对手的高度，又要结合目标的运动方向、速度和风速等诸多因素。

张桃芳悟性极强，在此后的两周内，他逐步参悟射击要领，战绩遥遥领先。他的事迹随后通过第24军《火线报》在阵地上广为流传。为了对付张桃芳，敌人调来一批炮兵观察员，准备以炮火覆盖进行报复。张桃芳意识到危险到来，下决心要打掉敌炮兵观察员。一天，张桃芳在狙击点位上看到，一名敌人从对面地堡跑出，快速躲在一块青石后面，举着望远镜四下观察。张桃芳目不转睛地盯着青石后面探出的人影，快速举枪将其击毙。接着，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观察。果然，从地堡里又钻出一个人影，继续搜索我军阵地上的目标。这次，敌人故意时不时快速暴露一下自己，来吸引张桃芳开枪以暴露位置。张桃芳耐性性子，快速移动到另一个射击点位，悄悄端起枪瞄着敌人快速晃动的头部。这一天，张桃芳连续击毙3名敌炮兵观察员，打瞎了敌炮兵的“眼睛”。

不甘失败的敌人很快调来狙击高手。对于张桃芳而言，真正的较量开始了。一天，张桃芳刚进入阵地，突然，一串子弹与他擦肩而过。狙击手的直觉告诉他，真正的高手出现了。可对面的敌人似乎有意吊人胃口，一连

令对手胆寒的子弹

□ 缪炳发



几天不再出现。几天后，张桃芳再次来到射击点位，刚要探头，一颗子弹径直朝他飞来。张桃芳就地一滚，趴在坑道里，佯装中弹。他十分清楚，此时对手一定在观察“战果”。过了一会儿，张桃芳悄悄爬到射击点位的另一侧，顺着子弹来袭的方向，仔细搜索对手位置。眨眼间，又一串子弹飞来。透过一处岩石的缝隙，张桃芳看到一挺带瞄准镜的重机枪藏在岩石后面，枪口正对着自己。张桃芳准备主动出击。他在堑壕里匍匐前进，向另一个射击点位移动。快到达位置时，他纵身一跃，故意暴露自己并快速进到点位上。这时，一串子弹再次打来。张桃芳深知对手的厉害，不仅打得准，而且反应极快。耐心等待了几分钟后，张桃芳抓住敌人停顿的一刹那，突然举枪并扣动扳机，子弹不偏不倚击碎了敌人的头颅。几乎与此同时，对面射来的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张桃芳终于赢得了这场生死较量。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张桃芳用这支不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步枪所展现的作战能力让对手胆寒，其战绩亦足以载入史册。战后，张桃芳荣立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摘自2022年2月24日《解放军报》）



隐蔽战线的传奇将军 李克农：

□ 鲍晓菁

被誉为“传奇将军”。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0年，李克农调中央特科工作，从此国民党CC组织的秘密经李克农小组有领导有计划地及时掌握。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克农参与与苏区和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建设，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冬，李克农奉周恩来指示去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使我党在西南一带有了公开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1年曾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曾任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于北京病逝。

李克农的故居位于安徽省巢湖市烔炀镇中李村，是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安徽省十大红色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会会有无数人前来瞻仰“传奇将军”的英雄事迹。

（摘自201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芜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情报和保卫等特殊战线上工作，以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工作方法，屡建奇功，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